
伪满留日教育述论

孔凡岭

从 1932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日伪统治东北整整 14 年。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在实行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竭力推行奴化教育,通过伪满派遣大批青年赴日留学便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笔者拟就伪满留日学生派遣的原因、留日教育的过程、留日学生类别、留学制度及留日教育的特点等问题作以下阐述。

—

吸引中国青年留学,是日本政府对华的一项既定政策。早在甲午战后它就认识到,教育中国留学学生,是日本影响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1898 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致其外务大臣的信中,曾经露骨地宣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的扩张势

力于大陆。”^①不久，他便正式以日本国家的名义，函告清政府总理衙门，邀请中国派遣留学生。接着又亲自向清政府官员面述，答应提供留学经费。

1908年清驻日公使曾与日本文部省签订协定，由日本东京京师等5所学校在15年内，每年接收165名中国学生，中国政府为每人每年缴纳200至250日元的委托教育费。从1919年起，中国方面的这笔委托费改由日本政府文部省拨款补贴。1921年日本文部省还补助日华学会15万日元，作为该会经营中国留学生宿舍之用。1923年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资助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便是其中的主要用项。

20年代中国各派军阀分别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日本政府便从中挑拨离间，企图通过这些军事留学生之间矛盾，播撒未来中国分裂的种子。此外，日本还引诱中国边疆少数民族青年留学日本，企图达到分裂华夏民族的目的。1929年4月国民政府驻日使馆报告说：“日本人常在黑龙江及内蒙古一带劝诱蒙古人来东留学，表面以援助求学为名，里面颇有阴谋。及到东后，用种种方法养成其亲日排汉之思想。”^②

由上不难看出，吸引中国青年留学，是日本政府近代以来为侵略中国而实行的一项对华政策。伪满派遣青年赴日留学不仅是日本既定政策的继续，而且更是为巩固其殖民统治。“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为长期霸占东北并进而侵占全中国，也愈加迫切需要对东北青年实行奴化留学教育。它在密谋建立傀儡政权时即提出，要使“新国家变成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防止汉族自身的资本主义化”。^③以后抛出的《处理支那问题纲要》等，基本思想也是要把东北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日本侵略者明白，光靠

① 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75年版，第8页。

② 国民政府档案，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一（1）—2391。

③ 旧《现代史资料》（11）续满洲事变，第560页。

武力征服是难以达到上述目的的,故在疯狂镇压东北抗日力量的同时,把加强奴化教育摆到了特殊重要的地位。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即开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1932年日本提出的殖民地教育方针是:“重仁义礼让,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独立安全;交友方面崇尚自重节义;而对于世界民族,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以达于世界大同。”^①这个方针的特点,是利用中国的封建思想,来调和东北青年对日寇入侵的仇恨,使之在思想上化敌为友,从而使东北的年轻一代驯服于日寇的血腥统治。以后这个方针又经多次修改,如“王道”变为“神道”,“亲仁善邻”变为“日满一体”等,其殖民地性质一步步深化。

在此方针的指导下,1933年日本侵略者通过傀儡政权开始教育整顿,留学教育尤受重视,正如伪满文件所指出的那样:“派遣留学生系为我国教育方针最重要行事之一。”^②日伪政权成立后,亟需各种汉奸人才,鉴于东北高等教育机构的严重不足,派遣青年去日学习就成为伪满教育的当务之急。伪《第四次满洲帝国文教年鉴》说:“当国家急需人材之秋,国内高等教育尚未充实,派遣留学生之意义益加重要。”^③1935年度伪文教部《满洲帝国学事要览》中也说:“我国的教育事业,其主力暂时还是在普通教育上,而高等教育机关的设施尚未周全。因此,现状是高等专门教育差不多都要依赖外国。因此,本部有必要实行对此制度的管理并极力提倡留学教育。”^④

伪满派遣留学生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培养亲日奴化人才。伪满文教部上述文件指出:“尤其是鉴于日满关系的特殊性,要对日本精神的理解并摄取日本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选拔多数优

① 《满洲教育》第1卷第1号,1934年1月。

② 武强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二),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③ 武强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一),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20页。

④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140页。

良青少年,先后派遣到日本的各学校以达目的。^① 康德十年度《满洲帝国学事要览》在谈到派遣留学目的时明确指出:“依据日满两帝国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我国于大同二年三月以来,对于留学日本之青少年,政府与以诸般方便之指导或支洽补助,以奖励其修学,而作两帝国之精神结合之楔子,并努力育成国家有为之人才,以至今日。故向日本派遣留日学生之本旨,非单为学习采择先进国家日本文物制度之所长,以资我国国势之革新向上,所谓企图文化之移植而已。”更重要的是“使纯真活泼之青少年,在亲邦国土、气候、风俗、人情环境内,历身生活,与日本青少年共相切磋琢磨,体得日本真精神,互相提携于次代,成为日满两帝国之不动摇的结合分子。”^② 这段话非常露骨地表明,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学习日本的文化科学,而在于使中国青年接受日本政治思想、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熏陶,以彻底“日化”,世世代代甘为日本的奴隶。

二

伪满留日教育以七七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留日学生愤慨臻于极点,几乎全部退学归国。稍后虽有人重返日本,但人数已较过去大减。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统计,1931年留日学生是2972人,1932年降为1121人,1933年为1357人。^③ 为扩大留日学生人数,1933年3月伪文教部首次派遣公费留学生,“同年7月复将事变前各省各县选派之留学生由文教部接管而整理之。当时名额,新旧计逾百名”。至1934年2月伪文教部“施行第二届选拔试验,选取百名”,于4

①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140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397页。

③ 旧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51页。

月派遣留学，“视前倍增矣”。^①以后，伪满每年派出公费生百名左右，同时，鼓励青年自费留学。

据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所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一书统计，1932年—1937年伪满留日学生数为：1932年330人，1933年500人，1934年900人，1935年1280人，1936年1590人，1937年达到最高峰，为1837人，呈逐年递增趋势。^②这当中，1932年的数字是事变前派出的，1933年及其以后的数字才是伪满政权派遣的。至1937年的5年中，共派出留日学生估计在2500名左右，平均每年约500名，其中100名左右为公费生，其余则为自费。如1937年在1844名（伪民生部统计数字）留日学生中，自费生为1464人，公费生为380人^③，自费者约占总数的80%。

众多的东北青年之所以赴日留学，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受全国重新掀起的留日高潮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留日教育经过几年的低沉，1934年起人数又有所回升。不少有眼光的中国人预见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为准备抗战，带着师夷制夷的心态东渡扶桑；加之当时金价下跌银价上涨，在金本位制的日本留学，反比在银本位制的中国读书合算，一些面临失学失业威胁的青年学子也纷纷涌向日本。这样就形成了30年代中期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第三个高潮。1934年秋留日学生增为2347人，1935年7月增至4500人^④，“1935年11月末，显示有突破八千之势”^⑤，此后虽略有下降，但“1936至1937两年通常都有五至六千留日学生”。^⑥这种全国性留日热不能不对东北青年产生影响。少数爱国分子为了准备抗日，而深入虎穴，进一步了解日本；多数人既不安心于亡

①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320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214页。

③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214页。

④ 《留日学生突增二千人》，见《留东新闻》1935年第5期。

⑤ 日实藤惠秀：前引书，第104页。

⑥ 日实藤惠秀：前引书，第104页。

国奴的屈辱地位,又看不到光明的前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以留学的形式暂避现状,先学点知识,以待他日。而在当时货币汇率有利的情况下,一些家境较好者也有经济能力赴日学习。

二是日伪的鼓励留学政策。伪满政权除以各种形式派遣公费留学生外,还重用留学回国人员,“对于留学生之卒业者,与总务厅人事处协力斡旋,就职于诸官署或特殊银行、公司等”。^① 1935年12月《满洲帝国文教部第二次年鉴》称:“留学生归国后之就职状况观之,以就职率言,几近于百分之百。”^② 后又下令凡经认可的留学生考试合格者,政府特殊会社予以特典任用。1936年末,伪满统治下的各主要城市举行第一次留学生考试,卒业留学生全部被伪政府及各特殊会社录用,并授予相当职务,伪满各部局亦任用了一批留日学生。^③ 这样,使留学具有很大吸引力,一些青年为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乐于赴日留学。一些汉奸亲日分子为表其对主子的忠心,更积极地将子女送往日本。据1936年日华学会的统计,在5909名中国留学生中“满洲国”学生有1833人^④,几占1/3。

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即日本政府把中国留学生分成“满洲国”留学生和中华民国留学生,监视他们互相往来。日本有一种名叫“刑事”的便衣警察。这些人常到留学生住处讯问、侦察,尤其是对自费生更是常去骚扰,打听行踪;询问经费由谁供给等等,严防其反日活动。尽管如此,东北留学生和关内留学生仍保持密切联系,并常有爱国举动发生。如1936年末傅作义在绥远一带奋起抗战,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都自发地行动起来予以支援。在日的东北留学生也受到感动,秘密参加募捐献金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驻日大使馆及主管留日事务的留日学生监督处旋告关闭,公派留日学生全部辍学归国。从国民政府教

①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186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321页。

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留学教育》,《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④ 《留日学生名簿》(日华学会),第10版。

育部根据该部出国留学生登记编制的《历年出国留学学生数(十八学年度——三十五学年度)》表册,可以看到1938—1946年每年留日学生均为零。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相继成立后,遣送了许多青年赴日留学。伪满留学教育也开始了新的阶段,即由伪满留学生与国民政府留学生并存变为清一色日伪政权留学生的局面。

在各汉奸政权中,伪满留学教育自然起着示范和主体作用。它不仅规章制度完备,而且留学人数也居于首位。依据1936年4月伪满确立的学席定额,每年派往日本国内的留学生222名,在日的伪满留学生数1938年为1519人^①,1939年1204人^②,1940年为900人^③,1943年1004人^④。其他几年未见到确切数字。这个数目大致和其他汉奸政权派出的留日学生相仿。不过由于他们留学教育时间短,进行晚,每年在日就读的留学生数肯定比伪满少得多,占主导地位的是伪满留学生。

这个阶段的伪满留日学生数虽年均仍超过千人以上,但比起战前的高潮期有了明显下降,1938年以后的几年呈递减之势。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伪满政权实行了留学生认可制,取消了公自费生的界限,改变了对自费生的放任政策,规定了留学的资格条件,这就限制了部分青年出国。二是受抗战形势的影响。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全国人民奋起御敌,东北广大爱国师生也纷纷走向了反满抗日道路,在关内留学生集体辍学归国的影响下,许多东北青年也离开了日本。三是原先高潮时期的留学生这时多到了毕业时间。以上三点造成了1938、1939、1940三年的留日人数滑坡。1938年开始的每年222名留学生定额的学席制度,使伪满在1940年后留学生数稳定在千人左右。

①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256页。

③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330页。

④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402页。

抗战时期,留日学生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不满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不甘于亡国奴的地位。据当年留学日本的一位山东学生回忆:“有些东北留日学生和我们相见时,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绝大多数不说‘满洲国人’,表示不忘自己是中国人。”^①少数爱国青年还暗中进行抗日活动。当年为摆脱日寇让其供职伪事的纠缠而留学日本的现青岛家政艺术学校校长叶瑛桐说:在柔道场上“认识了东北同学王德成”,两人“一见倾心”,以后“经常互访谈天。他谈到东北人民受日本人的压迫欺凌时,常常落泪……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一个姓于的同学屋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姓陈的台湾同学,他拿出一张写好的誓约书,大意是我们4个人为了抗日反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生死与共,万死不辞,如有违反,甘受最严厉的制裁等,下面的组织名称是‘东亚青年抗日联盟’,4个人都签了名之后,就烧了。以后王德成给过我几次抗日传单,叫我分发”。^②

除在日本建立反日小组织外,少数留日学生回国后还建立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如1937年冬至1938年,在日本东京留学的东北爱国青年所组织的几个读书会合并成立“东北青年救亡总会”。1938年该会部分成员陆续返回东北,在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了联络点。1943年该地改为“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中心设在沈阳,分支机构在牡丹江、哈尔滨、图们、吉林、长春等地。其中心任务是收集情报、积极配合抗日斗争向群众及青年学生传播革命思想。^③还有部分东北留学生在中共和进步人士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被选送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伪陆军军官学校“优秀生”吴宗若、张文善、王成善等,毕业返回东北时,中途潜往关内,参加了革命。^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实行严密的经济统制政策,留日学生

① 山东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页。

② 《留学生活》,第245页。

③ 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321页。

④ 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第319—321页。

的生活十分窘迫，“每天的配给定量只有 330 克大米，约 6 市两多点，实在是经常饿肚子的”。^①1945 年 4 月，日本政府为了进行所谓“大东亚圣战”，通令日本各学校停课一年，中国留学生大多因此返国。^②至抗战结束时，中国留学生只剩下 456 人，其中公费 339 人，自费 117 人。^③这些留学生战后由国民党政府资遣回国。至此，伪满留日教育宣告结束。

整个伪满时期究竟派出多少留日学生，未见到精确的数字，从上面所述情况推算，大体在 4000 人左右，平均每年派出 300 余人，常年在日人数千人以上。其规模不仅在东北近代史上空前绝后，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是少有的。

三

伪满留学教育的领导机构为伪文教部。东北“学生之留学，向由各省施行”，自 1933 年 7 月后改归伪文教部统辖，其经费亦由该部支发。^④1937 年 7 月伪文教部缩为教育司，直辖于新设的伪民生部内，伪民生部成为留学教育的统制机构。1943 年 4 月再设教育独立行政机构伪文教部。蒙古地方文教行政，属兴安总署（后改为蒙政部）统辖。

伪满政府对留日教育极为重视，为确保其奴化政策的贯彻，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完整严密的留学制度，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留学生认可制度。

伪满初期鼓励青年自费留学，对补助费生采取推荐的办法。先由各省、特别市推荐一定数量的候补生，再由伪文教部审查、考试，

① 山东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83 页。

②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二 二一—509。

③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一一—15363。

④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 81 页。

“录取的候补生在限定期间内到指定的留学校入学完了，才能成为补助留学生”。^①这种推荐只在“满洲国”内的毕业生中进行，而“满洲国”前的毕业生或中华民国学校的毕业生不在其列。这充分说明日伪对留学生“政治条件”的重视。

为加强对留学生特别是自费生的统制，1936年9月，伪满当局确立留学生认可制度，颁布《留学生之件》共五条，主要规定：“欲为留学生者，并依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之所定，受其留学之认可”；“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为令学习国家需要之学术、技艺，得对于留学生以给留学补助费”；“遇留学生有不当行为或至无成业之希望时，得撤销”其留学生之认可“或命其归国”。^②

与此相配合，1936年9月21日伪文教部令第三号和伪蒙政部令第八号公布《留学生章程》。次年1月修正为《留学生规程》，9月新设立的伪民生部将其重新发布。《规程》计22条，对留学生认可制度作了全面具体地阐述。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持有民生部大臣所发留学生认可证方可出国留学；获得认可证须为“留学认可试验合格者或毕业于其所指定之留学生预备教育施設者”。

第二，留学认可试验资格为“思想坚实，身体强健”之“满洲国”人，具有国民高等学校（即高中）毕业证明或经国民高等学力检定合格者，“缮具留学生认可呈请书”，并附履历书、毕业证书或毕业预定证明书、学业成绩证明书、身份调查书、留学誓约书、三个月内免冠照片，呈经管辖住所地之省长或特别市长，转呈民生部大臣。批准后方可参加。试验分笔试、口试和身体检查。笔试科目为国民道德、国语、数学等。

第三，“留学生之留学地、应入之教育施設、学习学科及留学年限，由民生部大臣指定之”，“不能于民生部大臣所指定期间内办竣

①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493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638页。

入学手续时,则留学认可证失其效力”。

第四,留学生如违背留学规程,或身体虚弱、学习成绩不良者,民生部大臣可取消其留学之认可。

第五,成绩特别优秀而家境贫困者,“支給留学补助费”,但毕业后有承担民生部大臣所指定职务之义务。^①

认可制原只限于大专学校留学生,后随着对中等学校留学生的重视,又分设高专之部及中等学校之部,中等学校留学生亦实行了这一制度。留学生认可制度取消了公、自费生留学资格上的区别,改变了对自费生放任的做法,把其也纳于统一监控之下。并且强化了民生部(文教部)大臣的管理权限,从而大大加强了对留日学生的统制。

(二) 留学生预备教育制度。

伴随留学生认可制度的施行,伪满乃设置学生预备教育以统制之。1937年5月伪文教部制定《留学生预备校规程》,公布实施。同年7月,留学生预备校开始授业,修业年限为1年。^②按照《留学生预备官制》,“留学生预备校属民生部大臣之监督,综理校务,统督所属职员”;教官6人为委任,“承校长之指挥,从事学生教育”。校长就教官中选派学监,担任学生训育指导。“校长认为有必要时,得聘用讲师”。^③

《留学生预备校规程》规定留学预备生资格为“思想坚实,身体强健,而合于下列各款之一者之满洲人”:一、国民高等学校(即高中)毕业或于该年度有毕业希望者;二、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程度学力检定合格者;三、民生部大臣认为有特别事情者。入学者要经过考试,考试为笔试、口试及查体。笔试为国民道德、国语、数学及经民生部大臣许可,校长指定之科目。学习科目为国民道德、日语、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或地理、历史及训练,每周授课总时数不得超

①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639—642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400页。

③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114—115页。

过 42 时或不足 24 时。期满校长认为所定之全课程毕业生, 授予毕业证书。民生部大臣对于留学生预备校毕业生发给留学认可证。^①

伪满专设留学生预备学校的目的, 在于为留日学生去日本之前在精神、学业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训练, 为去日本接受更深刻的奴化教育打基础, 这是日本侵略者为培养高层次“中坚人才”, 对留学人员进行思想统制的一种手段。

(三) 学席设置制度。

依据留学生认可制度, 经过留学生认可考试或留学生预备校毕业, 由伪文教部(民生部)大臣发给留学认可证之留学生, 再由驻日“满洲国”大使馆发给入学介绍书, 各赴留学地之指定学校办理入学手续。但因所指定日本学校招收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得而知, 往往会出现多寡不均, 使许多人不能按计划入校而再转赴别处。为解决这个问题, 伪满当局与日本文部省及有关机关协商, 于 1938 年 4 月开设学席制度, 除“满洲国”日本方面大学之外, 日本国内有关高等学校(即高中)、专门学校及大学内, 每年设立固定学席, 允许一定新生入学。每年伪政府可由文教部(民生部)直辖之留学生预备学校与认可考试合格者中, 按计划选派学生。开始时设置学席定数为 222 名。对于入学资格认为不足者, 使入特设预科或命其返国^②。

(四) 监督制度。

关于留学生的指导监督机关, 1935 年 2 月在驻日“满洲国”大使馆内附设学务处, 学务处于驻日特命全权大使监督下, 处理凡在日本国内之满洲国学生之指导、监督并保护, 以及关于其他一切

① 武强编: 前引书(二), 第 115—119 页。

② 武强编: 前引书(二), 第 399 页。

留学事务”。^①1936年废止学务处,该年9月敕令发布的《关于留学生之件》中规定:“留学于日本国内学校之留学生,由驻扎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监督之。”^②1937年3月更改日本国驻在外交官官制,留日学生指导监督由驻日特命全权大使直接掌管,对留学生的监督更为强化。具体规定包括:

1. 组织留日学生会,由留日学生相互监督。“留日学生必须为留日学生会会员,关于所属组织须负连带责任”。

2. 对留学生身份予以严格控制。“留学生如改姓、改名或关于其他身份上有所变更时,须立即缮具变更呈报书”,“呈送大使馆”,“补助费留学生拟从事有报酬之职务时,须受大使馆之许可”。

3. “留学生到达留学地后,应立即缮具住所呈报书”“呈送大使馆”;变更住所时应立即向大使馆呈报;“凡归省转地疗养入院,或一星期以上之旅行,应立即将其目的地及期间呈报大使馆”;“大使馆认为有必要时,得指定留学生之住所”。

4. 留学生除遵守日本之法规外,拟集会或拟出席其他集会时,拟组织团体或拟加入团体时,拟发行杂志或其他印刷物时,以特定之目的,拟向留学生中求署名时,或拟募款时,均须经大使馆之许可。

5. 留学生如违背有关法规,将受到其惩戒。惩戒分谴责、停发或取消补助费、取消留学认可、勒令归国四种,第一种由驻日特命全权大使行之,其余三种由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行之。^③

以上制度,严格了日伪留日学生的选拔及监督管理,加强了对留日教育的统制,为确保其奴化教育方针的贯彻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277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638页。

③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106—108页。

四

伪满时期的留日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可分成许多类别,由此可进一步窥探其留日教育的状况。

(一)从学历上分,主要有大专学校留学生、中等学校留学生、教员留学生、社会教育指导者留学生等。

大专学校留学生。这是留学生的主体。伪满初期对自费留学不加限制,而公费生主要是派往日本大专学校。1936年颁布的《留学生规程》和确立的留学生认可制,取消了公、自费生的区别,留学资格从学历上要求必须具有高中程度而入日本大专学校学习。后认可制虽扩大到中等学校留日学生,但主要还是向日本大学和专门学校派遣。派往高等学校(即高中)及大学预科者也是为进入大专学校作准备。如1937年底伪满留日学生共1844人,其中就读于官立私立大学311人,官立私立专门学校799人,官立私立女子专门学校139人,以上三项1249人,约占留学生总数的2/3。^①再如,1940年在900名伪满留日学生中,官立私立大学205人,官立私立专门学校453人,合计658人,超过留日生总数的2/3。^②

中等学校留学生。从目前见到的史料看,1934年和1935年伪满各派出9名补助费生到日本中等学校学习。^③据伪满1937年12月底的统计,留日中等学校学生共123人。^④1939年8月中等学校留学生151人。^⑤自1940年起,伪满“政府补助费生派遣日本工业学校者,每年15名内外;东亚育英会给费生10名内外;向师范学

①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213—214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330页。

③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420页。

④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214页。

⑤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254页。

校派遣此等学生,基于各省市之推荐,施行特别留学认可制度”。^①伪满 1940 年 5 月 1 日统计,留日中等学校学生 130 人。

教员留学生。为了使在职教师都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去教育学生,1932 年日伪在东北清洗教师队伍,数千人被清洗和转业。^②同时在伪首都新京开办“教员讲习会”,后成立“教员讲习所”。另外则向日本选派教员留学生,使之“受日本学校教育之实地训练,并以补益日满亲善”;实质上是为推行奴化教育培养骨干教师。^③从 1937 年 7 月起,伪满政府便从中小学教员中选拔所谓优秀者送往日本,每年约 20 多名,学习期限一年。从 1933—1936 年,除 1934 年派了两次外,其余每年一次,每次 20 多人,4 年 5 次共计 111 人。以后派遣教员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史料中可看出,这种留学一直持续下去,并从小学扩大到大学教员。伪康德十年度《满洲帝国学事要览》称:“自建国初起,一般留日学生,同样于大学、中等、初等学校教官中选拔优秀者向日本国派遣,以磨练人格,而使学术技艺之研究与我国教育界之划期进展。故于康德九年三月四日令《民生部教官留学规程》公布施行,每年向日本国派遣定数之教官,以图其资质向上及大学教官之养成,并使研究特殊学术。”^④1943 年伪满派遣留日教官 105 名,其中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36 人,东京文理科大学 3 人,广岛文理科大学 6 人,广岛高等师范学校 26 人,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34 人。^⑤此数量较之前期的每年 20 多名增加了不少,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的 5 倍。

社会教育者留学生。为训练对农民进行奴化教育的人员,“养成地方及对农村最关切要之社会指导者”。^⑥1934 年 12 月伪满向

①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 399 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 683 页。

③ 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4 页。

④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 400 页。

⑤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 395 页。

⑥ 《满洲帝国文教部第二次年鉴》,康德二年十二月刊行,伪满文教部编纂。

校派遣此等学生,基于各省市之推荐,施行特别留学认可制度”。^①伪满 1940 年 5 月 1 日统计,留日中等学校学生 130 人。

教员留学生。为了使在职教师都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去教育学生,1932 年日伪在东北清洗教师队伍,数千人被清洗和转业。^②同时在伪首都新京开办“教员讲习会”,后成立“教员讲习所”。另外则向日本选派教员留学生,使之“受日本学校教育之实地训练,并以补益日满亲善”;实质上是为推行奴化教育培养骨干教师。^③从 1937 年 7 月起,伪满政府便从中小学教员中选拔所谓优秀者送往日本,每年约 20 多名,学习期限一年。从 1933—1936 年,除 1934 年派了两次外,其余每年一次,每次 20 多人,4 年 5 次共计 111 人。以后派遣教员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史料中可看出,这种留学一直持续下去,并从中小学扩大到大学教员。伪康德十年度《满洲帝国学事要览》称:“自建国初起,一般留日学生,同样于大学、中等、初等学校教官中选拔优秀者向日本国派遣,以磨练人格,而使学术技艺之研究与我国教育界之划期进展。故于康德九年三月四日令《民生部教官留学规程》公布施行,每年向日本国派遣定数之教官,以图其资质向上及大学教官之养成,并使研究特殊学术。”^④1943 年伪满派遣留日教官 105 名,其中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36 人,东京文理科大学 3 人,广岛文理科大学 6 人,广岛高等师范学校 26 人,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34 人。^⑤此数量较之前期的每年 20 多名增加了不少,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的 5 倍。

社会教育者留学生。为训练对农民进行奴化教育的人员,“养成地方及对农村最关切要之社会指导者”。^⑥1934 年 12 月伪满向

①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 399 页。

② 武强编:前引书(一),第 683 页。

③ 齐红深:《东北地方教育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94 页。

④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 400 页。

⑤ 武强编:前引书(二),第 395 页。

⑥ 《满洲帝国文教部第二次年鉴》,康德二年十二月刊行,伪满文教部编纂。